

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

《鲲龙》:大国重器的技术诗学与生命交响

◎冯永平

群像立体刻画:人性褶皱的生命辩证

《鲲龙》中,展现了深刻的人性刻画,特别是对科研者群像的立体塑造,摒弃了传统工业文学中的“献祭式英雄”形象,转而探索人性的完整与复杂。

作品通过刘海洋这一角色,生动描摹了中国航空百年的历史缩影与家族传承。他既是“航四代”,承载着家族的使命,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实验室中的通宵达旦与面对家庭困境时的仓皇,技术攻坚的坚定与情感受挫的茫然,这些细腻的瞬间共同建构起了刘海洋的多维形象,使其光环之下,人性真实可触。

总设计师周旭东,则是老一辈科研精神的缩影。他坚持“细节决定成败”,即便因积劳成疾频繁住院,仍坚守岗位。这种坚守,不是悲壮的牺牲,而是对科研纯粹性的深情守护,体现了老一辈科研者的执着与奉献。

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十分具有突破性。冯雪敏这一角色打破了“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她既能展现超越性别的理性,又不失女性特质。在学术会议的正式场合与日常生活中的随性之间自如切换,这种“双重性”不但展现了知识女性的独立与自信,也暗示了技术理性与性别身份的和解可能。

陈薇的形象则更为复杂,她代表了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困境与潜在异化。从“上海机电所面试第一名”的天才,到因职场竞争与个人野心引发同事对其职业操守的质疑(如被怀疑暗中设置技术障碍以凸显自身价值),再到其技术能力被客观认可,并与冯雪敏达成工作共识的微妙转变,她的轨迹恰似“鲲龙AG600”试飞过程中的起伏,折射出技术理性与人性暗面交织的灰度地带。这种书写,为工业文学引入了深刻的“信任危机与和解可能”的讨论,展现了人性在名利场与理想国之间的张力。

更深层次上,《鲲龙》在科技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下,恪守着人性自觉。它拒绝将科研者简化为“工具人”,而是深入挖掘他们的“凡人属性”。刘海洋的自我怀疑、冯雪敏的性别偏见挣扎、周旭东对家人的愧疚,这些“不完美”的瞬间,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家国情怀,也接纳现代生命观,即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寻求个人幸福与家庭责任的平衡。

叙事双线缠绕:科技生活的复调交响

《鲲龙》有一个“独特点”,就是它的“双螺旋叙事结构”,这一结构美妙契合了“鲲龙AG600”水陆两栖的物理特性。作品通过“技术革新—受挫—转机”的命运曲线(技术线)与主角们的婚恋纠葛、代际冲突、生存焦虑等生活副线(生活线)的交织,构建了一套“刚性

直面生死的豁达态度

草原牧民对待生死的独特态度,是《草原十年》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新生与死亡,是作者始终关注的话题。草原小镇的尽头就是殡仪馆,所有生命都不断向它走去,终有一天会抵达。作者描写人们对待殡仪馆的态度:“镇上的人看到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并不会觉得悲伤,所有人都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即便伊敏河每年都夺去至少两个人的生命,人们依然安居在它的两岸,没有悲痛,也了无怨恨。”在草原上,死亡并非是一种禁忌,而是被视为生命的自然归宿。书中讲述了一位老牧民的离世,他的家人和邻里并没有过度的悲伤和哭泣,而是平静地为他举行传统的葬礼。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回归自然,就像草原上的草木一样,经历荣枯循环。

但这种对死亡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消极对待。相反,牧民们在活着的时候,对生活永远饱含着热情。他们热爱着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时光。即使面对自然灾害、牲畜疫病等重重困难,他们也从无怨言命运的不公,而是默默地承受着苦难,并平静地将它们消化。

生活变迁的细致刻画

《草原十年》以时间为经线,以牧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纬线,编织出了一张丰富多彩的生活变迁之网。在这十年里,安宁见证并记录了草原小镇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曾经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破旧的土坯房被崭新的砖瓦房所取代。这种物质层面的变化,是草原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直观体现。

然而,更触动人心的是牧民精神世界的蜕变。年轻一代牧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利用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世界,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尝试发展特色旅游业。书中有一位叫巴特尔的年轻牧民,他在十年前还只是跟随父辈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通过网络了解到生态旅游的商机,于是他开始精心打造自家的牧家乐,向游客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的魅力。他的生活不再仅仅围绕看牛羊,还融入了与来自五湖四海游客的交流与互动,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憧憬。

安宁在描绘这些生活变迁时,并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他们的故事来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对草原的影响。这种微观视角的

文化传承的坚守与挣扎

在这十年的生活变迁中,草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经历着坚守与挣扎。安宁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一位

骨架与柔性肌理”共生的复调美学体系。

技术线上,《鲲龙》严谨遵循“问题—攻关—突破”的科学逻辑,同时注入了强烈的叙事张力。从航电系统数学建模的挑战,起落架调试的反复,到绝缘测试中微小的电流波动,每个技术节点都被精心转化为“科技奏鸣曲”的乐章。例如,“铁鸟实验”紧张刺激,如同快板;“通电测试”则悬疑重重,类似行板;而“攻克航电核心技术的预期前景”则承载着辉煌的期许,堪称终章序曲。尤为高明的是,技术探索的艰辛与人物内心的波澜紧密相连,如冯雪敏在丧母剧痛后强忍悲伤回归航电攻关现场,其个人生命的破碎感与修复技术系统缺陷的使命感形成深刻共鸣;刘海洋处理郭子铭悲剧的无力感与协调技术资源的责任感相互撕扯,这种“技术困境与生命困境的共振”赋予了工业叙事更为厚重的情感内涵。

生活线则以“纠葛—断裂—和解/修复”的情感逻辑,细致描画了科研者的私人领域。刘海洋与冯雪敏从技术争论到情感依赖的渐进过程,冯雪敏在母亲病逝后的崩溃与艰难自我重建,郭子铭的悲剧对直接相关者(刘海洋、周敏、陈薇)造成的深远心理冲击,以及周敏与王少鹏初现端倪的情感萌芽,这些情节一同构成了大国重器的“人性底座”。当技术攻坚的曙光初现(如机翼静力实验的成功)时,人物的精神状态亦随之获得片刻喘息或方向确认(如杨占山的解脱感),预示了国家荣耀与个人幸福未来可能达到的和谐统一,彰显了伟大事业与凡俗人性在螺旋式上升中终将寻求平衡的主题。

《鲲龙》中两条线索通过精妙的“互文设计”实现了深度融合。机翼结构裂痕与人物情感创伤的镜像反射,揭示了技术缺陷与人性裂隙的内在联系;5万多个结构零件与人心复杂系统的隐喻嵌套,则暗示了机械精密性与人性完整性的相互映照。

时代精神坐标:科技文明的人文刻度

《鲲龙》作为一部深度描绘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作品,其终极价值体现在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一扇透视科技文明本质与方向的窗口。当“鲲龙AG600”翱翔天际,它不单是一次可救护50名遇险人员的守护

者,更是民族在科技浪潮中对纯粹性精神追求的象征。在消费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膨胀的背景下,《鲲龙》通过展现老一代科研者的赤诚信仰与新生代追求事业与幸福共生的生命理性,熔铸出专注、精进、协同、共享的文明伦理基因,这既是对传统士人精神的承袭,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与幸福权利的现代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鲲龙》以文学之力精准回应了“卡脖子”时代的集体焦虑,通过科研团队在质疑与协作中艰难探索、被迫直面航电系统核心技术从零攻关的故事线,将抽象的“自主创新”转化为充满悬疑与挑战的生命实践。作品中,何云贵等海外人才归国的选择,让家国情怀摆脱空洞,成为有血有肉的取舍;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攻关,既彰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更在微观层面搭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程学范式”,强调科技突破是无数个个体智慧与意志在克服分歧中凝聚的交响。

从历史维度看,《鲲龙》架设了精神的航标,将“鲲龙AG600”的基因谱系追溯至百年航空梦,展示了民族从仰望星空到驭风而行的精神接力。这种跨越世纪的传承与精进,使《鲲龙》超越了单一飞行器的历史,成为文明体在科技长征中重新定位、找回精神坐标的史诗。

同时,《鲲龙》也是新时代科技文化自信自觉的生动体现。它摒弃网络文学流行套路的,以谨慎态度和雅正文字书写两代航空科学家的报国之心与生命历程,为网络文学承担时代命题、书写民族精神提供了示范。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并未给出简单的胜利公式,航电系统的核心困局仍在破解之中,这恰恰真实反映了自主创新道路的曲折漫长,也为其最终可能的突破埋下了震撼人心的伏笔。

因此,《鲲龙》所标定的“时代精神坐标”,其核心在于“人文”。它深刻度量了科技发展中人性尊严的守护、个体价值的实现、历史传统的延续、集体协作的温度及文明伦理的构建,宣告真正的科技强国应是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同频共振、硬核实力与软性魅力交相辉映的文明高地。

淋漓尽致。而在讲述牧民的生活故事时,她的语言又充满了生活的温度和情感的力量。她用细腻的文字描绘牧民们的喜怒哀乐,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书中的语言节奏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在描写紧张的生活场景时,语言节奏明快,如疾风骤雨;在表达对草原的宁静与美好的感悟时,语言节奏舒缓,似潺潺流水。这种张弛有度的语言风格,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沉浸于书中的情境,感受草原生活的独特魅力。

时代价值与深远意义

《草原十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从时代价值来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草原牧民生活的窗口,让读者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草原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草原人民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它也让人们思考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如何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

从深远意义来说,这部作品是对生命、自然、苦难与希望的深刻诠释。它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中遭遇多少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像草原牧民一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坚韧不拔地走下去。《草原十年》不仅是一部关于草原牧民生活的纪实散文,更是一部关于生命与生活的启示录,它将长久地影响着读者,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诗人方纲、燕南飞捧出的诗集《西辽河长歌》,既是为曾经的西辽河历史塑像,也是为如今的西辽河两岸流淌的幸福时光立碑。

《西辽河长歌》共分《序歌》《哈民遗址风》《玉龙出北方》《契丹、契丹》《马背英雄》《烟盟北疆》《红色河曲》《尾声》八个章节。每个章节基本上都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既有历史古迹的贯穿与众多人物的刻画以及许多故事传说的还原,也有作者语言、思想的参与和解析。众多诗歌技巧的运用,更是为这部长诗增加了阅读的快感与回味。

《序歌》的开篇叙述,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澜壮阔,很有气势与典范。“开天辟地就有的崇山峻岭/一草一木,都在倾听天籁之音。/直上云霄的/手势/演绎着不朽的传奇和故事。/摔碎一声叹息后/扶摇直上/九万里光阴中,傲视人寰。/回眸一笑,你鸿蒙初开的样子如此绝美。/矗立于大地之上/如同顶天立地的手指/指点江河的来龙去脉。”诗人对西辽河远古时期的情景描述,具有电影镜头穿越的质感与概念,似乎一开头就在暗示西辽河的非凡经历与文明萌芽。诗人以奔涌,以草木一样的巨民,以母亲的名义,来呼唤一条河的诞生,其实就是在表达对西辽河的敬畏与感恩,“一代又一代人/大河的渡口,尽 come 此寻根的人。”

《哈民遗址风》中写道:“就是那些鸣叫/养活了时光。/累倒的筋骨/化成一条条河流,一道道绳索/一头拴着故乡/另一头也拴着故乡。/慷慨奔赴,不是独领风骚/是将山水和热土,密密地缝合/一茬一茬的生灵,被累死/才会有前一茬一茬的生灵/破土而出。”这章从哈民遗址掀起的情感追溯风暴,是安静的,原始的,动荡的,诗人借沙陀子、环壕、种子、陶片、烽火等,来重返与记录史前的那段哈民时光,既苍茫辽阔,又震撼人心。

《玉龙出北方》这章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采用既具象又抽象的表现手法,来展示华夏民族的图腾(玉龙)形象,写得风雷激荡且风生水起,“武器/可以收割一条古老河流的恩怨/让忐忑的阳光/可以随心所欲地照下来/照耀鸟兽/也照耀草木。还会有微笑的脸庞/泪流满面。/该遗忘的就遗忘吧!/留下我/记得你。/江山,就是扛着自己的诗句行走/只消一夜/就渡了江湖。/王者,就是大地上的草民/只用河流那么柔软的琴弦/就弹醒了春秋”。

《契丹、契丹》这章在整部诗集中的分量很重。也许诗人觉得契丹人在西辽河两岸的金戈铁马与繁衍生息,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值得推介,因此不惜笔墨。“无非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无非是从西辽河到黄河,再到长江/无非是你融入我,就是我融入你。/大辽也好,契丹也罢/中原也好,江南也罢/中华大地上/我们的名字/被同样的笔墨所书写。”结尾的心路历程显示,诗人也是从历史中的刀光剑影到民族大融合过程的旁观者、参与者,再次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弥足珍贵与继往开来。

《烟盟北疆》这章写的是大清王朝努尔哈赤的创业史与爱情史,以及其后的几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与西辽河的因缘。在众多的分行文字中,诗人无不频频借来历史典故,加以充分发挥联想,把一幅帧面容清晰的清王朝历史画像悬挂在我们面前。“后世的乾隆皇帝,顺着祖父的音讯/看罢了草原/听罢了辽水/他就像一个乖孩子。/比草原更广阔的/不是马蹄,是心胸/比心胸更广阔的//不是草原,是光阴。”诗人在此环节的阐述,由外而内,由表及里,无意中就露出了哲理的肌理与纹路。

《红色河曲》写的是红色革命时期的人物与故事。诗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在西辽河的多元时空中穿梭,那么红色河曲,是必然要高唱的革命歌谣,这不仅历史的延续与传承,更是对那种冲锋陷阵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点赞与珍藏,其间的用意不言而喻。“一个个消逝的名字/一个个怒吼的弹孔/被大江大河的琴弦,弹响。/一个个音符/在边关/在隘口/在沙场/在壮士们的心窝里/成为用血泪与烟火锻打出的/绝唱!”

《尾声》的叙述基本上是比较平缓的,宛如大海喘息后的宁静。这不仅情绪的平复,也是精神的慰藉。西辽河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那么西辽河两岸人民生生不息、拼搏奋斗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是我们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一部分。诗人在此的归纳与总结以及展望未来是虔诚的,激动的,深入骨髓的。“西辽河,西辽河!/我爱你亘古奔驰的样子,像一条命/一条扑进祖国的怀抱里!/西辽河,西辽河!/我们都有一条和你奔赴的命/还有一个和你共守家园的梦/不死爱着你,还能去爱谁!/西辽河,西辽河!/我们把你一次奔赴当作一次长征吧!/把骨子里两万五千里的挣扎与豪迈/一寸一寸/尽付于永不止息的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西辽河:映照金戈铁马,也映照幸福吉祥

——长诗《西辽河长歌》赏析

◎季川

